

居民收入倍增与中国经济增长

杨天宇

内容摘要： 本文的测算表明，如果劳动收入比重在“十二五”期间能由2007年的42%左右提高至2015年的50%左右，则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将由目前的57%上升到60%，居民收入将实现倍增。但劳动收入比重的提高既有可能引起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使中国企业丧失低成本优势，抑制经济增长；又有可能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有利于经济增长。问题是两种方向相反的效应哪个更加显著，这实际上是一个需要计量分析的实证问题。本文利用1992-2007年的资金流量表数据，证明我国经济增长属于工资驱动型，提高劳动收入比重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如果在“十二五”期间能够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将给“十二五”期间的本国总产出带来5.8%的增长效应。这一研究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劳动收入比重和促进经济增长并不矛盾，通过提高劳动收入比重而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将大大有利于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

关键词： 居民收入倍增 劳动收入比重 经济增长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十二五规划”期间的一个重要政策目标，就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与学术界流行的各种版本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有相似的含义。从实质上来说，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与“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基本上是一回事。据“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者、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的测算，如果2010-2015年（即“十二五规划”期间）能够实现居民收入的倍增，则按照“十二五”期间GDP年均增长8%的预测，则“到2015年，我国GDP将达53.2万亿人民币。假设那时居民收入占GDP的总量由现在57%上升5个百分点，到62%，人均居民收入将可望翻一番，达23206元”。换言之，只要“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幅度达5个百分点，就能够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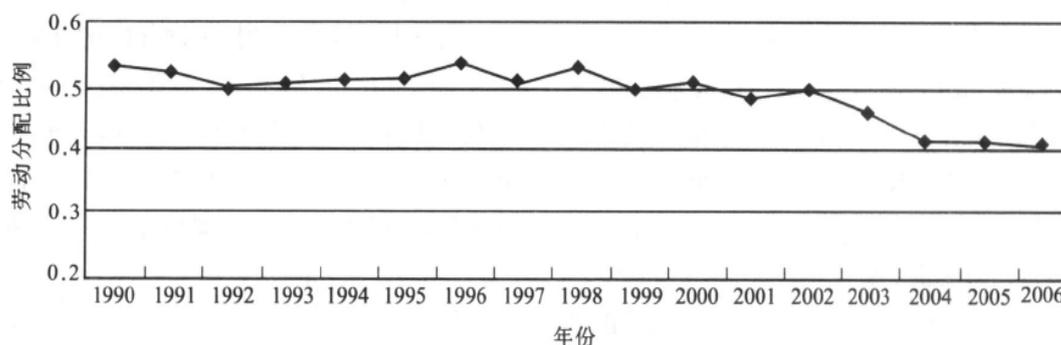
不过，无论是“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还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上升”，都产生了很大的争论，持反对意见的人大多认为，居民收入提高过快将会提高劳动成本，使我国丧失低成本的优势，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实证分析证明，提高上述的两个比重，乃至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总效应是正面的。

首先需要指出，上述苏海南对于居民收入倍增后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预测，可能有些高估。原因是我国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经常高于规划经济增长速度。例如，“十五”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年均7%左右，到2005年按2000年价格计算，“十五”期间我国GDP

年均增长实际上是 9.5%。再如，“十一五”时期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7.5%，而“十一五”前 4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达 11.4%。所以，目前学术界预期的“十二五”期间 8% 的增长速度，应该比实际情况有所低估。根据“十五”和“十一五”的经验，我们保守估计“十二五”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9.5%，则“十二五”期间若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则意味着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由现在的 57% 上升到 2015 年的 60% 左右。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虽然含义不同，但二者有密切的关系。根据资金流量表提供的数据，劳动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一直在 70% 以上，近年来更达到 80% 左右。另据白重恩、钱震杰（2009）的测算，1996-2005 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有 60% 左右可以归因于劳动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下降。这说明，劳动收入占 GDP 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以作为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变化趋势的代理变量。因此，本文重点研究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图 1 可以看出，1990 年以来中国的劳动收入比重（劳动报酬占 GDP 的比例）一直在不断下降。2007 年，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为 42% 左右，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比重都在 50% 以上。如果要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需要提高到 60%，若劳动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保持在 2007 年的 83% 的比重不变，则要求到 2015 年，劳动收入比重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到 50% 左右，这将接近于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



提高劳动收入比重虽然已经成为“十二五”规划的政策目标之一，但引起的争议也很多。提高劳动收入意味着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这将引起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使中国企业丧失低成本优势，显然会影响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然而另一方面，劳动收入比重的提高将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这显然有利于经济增长。问题是两种方向相反的效应哪个更加显著，这实际上是一个需要计量分析的实证问题。不过我国国内对此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媒体和互联网上，相对规范的学术性研究还比较少。而发达国家的学者对此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Bowles 和 Boyer(1995)利用 1961—1987 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数据，研究了劳动收入比重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英国和美国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总产出有正效应，而法国、德国和日本的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总产出有负效应。他们把前者称为工资驱动型 (wage-led)，把后者称为利润驱动型 (profit-led)。在 Bowles 和 Boyer 研究的基础上，Naastepad 和 Storm(2007)利用 1960—2000 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日本的数据，发现英

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荷兰属于工资驱动型，而美国和日本属于利润驱动型。Stockhammer、Onaran 和 Ederer(2007)对 1962—2005 年欧元区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此期间欧元区属于工资驱动型。可见，在不同的国家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同的，要考察一个国家劳动收入比重提高的宏观效果，需要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借鉴 Stockhammer (2008) 研究劳动收入比重影响经济增长的方法，将劳动收入比重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并利用 1992-2007 年的中国资金流量表数据估计劳动收入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居民收入倍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只测算了居民收入倍增这一政策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没有考虑经济增长是否有助于居民收入倍增目标的实现，即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是一个外生的政策变量。本文认为将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设为外生变量是合理的。因为“十二五”期间的居民收入倍增，不仅仅来源于居民分享“十二五”期间的经济增长成果，而且还要来源于对“十二五”规划之前居民收入过低的“补涨”或“补偿”，否则在短短 5 年之内难以实现居民收入倍增^①，也难以对扩大内需起到相对较大的作用。

二、研究设计

Stockhammer (2008) 建立了一个总需求模型以研究劳动收入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该模型中，总需求 (Y) 是消费 (C)、投资 (I)、净出口 (NX) 和政府支出 (G) 的总和，而消费、投资、净出口分别是收入 (Y)、劳动收入比重 (Ls) 和其他控制变量 (z) 的函数，其中 z 与收入和劳动收入比重无关；此外政府支出被视为仅仅是收入 Y 的函数。总需求模型可用下式表示：

$$Y = C(Y, Ls, z_c) + I(Y, Ls, z_I) + NX(Y, Ls, z_{NX}) + G(Y, z_G) \quad (1)$$

大多数宏观经济模型都不考虑国民收入分配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只考虑净出口会受到劳动成本的影响，因此上述模型在 $\partial C / \partial Ls$ 和 $\partial I / \partial Ls$ 等于 0 的情况下将退化为标准的凯恩斯模型。我们通过对 (1) 式进行变换，就可以得出劳动收入比重影响经济增长的关系式，并将其用于中国的数据。首先我们对 (1) 式进行微分，可以得到下式：

$$\frac{dY}{dLs} = \frac{h_2}{1 - h_1} \quad (2)$$

$$\text{其中 } h_1 = \left(\frac{\partial C}{\partial Y} + \frac{\partial I}{\partial Y} + \frac{\partial NX}{\partial Y} + \frac{\partial G}{\partial Y} \right), \quad h_2 = \left(\frac{\partial C}{\partial Ls} + \frac{\partial I}{\partial Ls} + \frac{\partial NX}{\partial Ls} \right)$$

(2)式中的 $\frac{1}{1 - h_1}$ 是一个标准的乘数，在稳定状态下为正数。 $\frac{dY}{dLs}$ 的正负取决于 h_2 ，即

消费、投资、净出口对劳动收入比重的微分和。若 $\frac{dY}{dLs} > 0$ ，则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总需

^① 与此相对比，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用了十年时间（1961-1970）。

求产生正效应，反之 $\frac{dY}{dLs} < 0$ ，则劳动收入比重对总需求产生负效应。

我们需要计算的是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2）式仅仅揭示了劳动收入比重与总需求的关系，所以还不够。我们真正需要计算的是（3）式：

$$\frac{dY/Y}{dLs} = \frac{h_2/Y}{1-h_1} \quad (3)$$

也就是劳动收入比重对经济增长率（ dY/Y ）的影响，这需要将（2）式等式右边的分子也除以 Y ，即变成（3）式。要计算出精确的 $\frac{dY/Y}{dLs}$ ，需要分别计算出 h_2/Y 和 $\frac{1}{1-h_1}$ 。

根据 h_2 的定义，我们可将 h_2/Y 变换为 $\frac{\partial(C/Y)}{\partial Ls} + \frac{\partial(I/Y)}{\partial Ls}$ 之和。这里我们将 $\partial NX/\partial Ls$ 排除在外，也就是只考虑封闭经济下的情形。原因是 Stockhammer, Onaran and Ederer (2007)

已经证明，劳动收入比重对净出口的影响取决于贸易伙伴国的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程度，这个因素是我国政府的政策不可控制的，而且该数据在目前情况下难以得到，因此本文主要关注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内需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frac{1}{1-h_1}$ 则可以通过分别计算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对国民收入的弹性并加总而得出。

下面我们需要讨论如果估计 h_2/Y 的两个分项，即 $\frac{\partial(C/Y)}{\partial Ls}$ 和 $\frac{\partial(I/Y)}{\partial Ls}$ 。首先我们来看劳动收入比重对消费率的影响。在不考虑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的前提下，我们将初次分配的国民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 W ）和财产性收入（ R ），两者边际消费倾向的差额就是收入分配对国民总消费率的净影响；然后我们借鉴 Stockhammer (2007, 2008)，用劳动收入比重作为收入分配的代理变量，所以 $\partial C/\partial W$ 和 $\partial C/\partial R$ 的差额就可以被看作是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总消费率的净影响。而 $\partial C/\partial W$ 和 $\partial C/\partial R$ 又可以通过如下公式求出：

$$\frac{\partial C}{\partial W} = e_{CW} * \frac{C}{W}, \frac{\partial C}{\partial R} = e_{CR} * \frac{C}{R} \quad (4)$$

其中 e_{CW} 和 e_{CR} 分别为消费的劳动收入弹性和资本收入弹性。从（4）式中可以看出，只要通过计量分析求出了这两个弹性值，就可以将二者相减得到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总消费率的净影响 $\frac{\partial(C/Y)}{\partial Ls}$ 。

下面我们再看劳动收入比重对投资率的影响。在标准的经济模型中，投资常被表示为产出、利率或其他资本成本等变量的函数。为考察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投资率的影响，我们将资本收入(即财产性收入 R)纳入解释变量。如果国民收入 Y 保持不变，则资本收入对投资的边际影响 ($\partial I/\partial R$) 可以代表收入再分配对投资的影响，具体地说，如果 $\partial I/\partial R > 0$ ，则意味着 $\frac{\partial(I/Y)}{\partial Ls} < 0$ 。假如我们将投资函数设为 $Y = f(Y, R)$ ，则对若 Y 不变，对

$Y = f(Y, R)$ 求微分可得 $\frac{\partial(I/Y)}{\partial Ls} = -\partial I/\partial R$ 。而 $\partial I/\partial R$ 可由下式求出：

$$\frac{\partial I}{\partial R} = e_{IR} * \frac{I}{R} \quad (5)$$

其中 e_{IR} 是投资的资本收入弹性，显然，只要求出了 e_{IR} ，就可以求出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总投资率的净影响 $\frac{\partial(I/Y)}{\partial Ls}$ 。

因此，我们的研究路线是：第一步，通过计量分析求出 e_{CW} 、 e_{CR} 和 e_{IR} ；第二步，求出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总消费量和总投资率的净影响 $\frac{\partial(C/Y)}{\partial Ls}$ 和 $\frac{\partial(I/Y)}{\partial Ls}$ ；第三步，计算出 h_2/Y 和 $\frac{1}{1-h_1}$ ；第四步，计算出劳动收入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frac{dY/Y}{dLs}$ ；最后，得出居民收入倍增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

本文涉及的变量主要包括劳动收入比重、国内生产总值、劳动收入（劳动者报酬）、财产性收入、总消费、总投资等指标。《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提供了按收入法核算的 GDP，分为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四部分。本文用劳动者报酬占 GDP 的比例来衡量劳动收入比重 LS。国内生产总值(Y)、总投资 (I)、劳动者工资性收入(W)和财产性收入(R)均以 GDP 平减指数进行了平减。居民消费(C)以 1992 年为 100 的消费价格指数将名义居民消费调整为实际居民消费。本文使用样本为 1992-2007 年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全国 29 个省份面板数据。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劳动收入比重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实证结果

本文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ADL) 和误差修正模型 (ECM)，对劳动收入比重影响消费率、投资率的程度进行估计，以得出 $\frac{\partial(C/Y)}{\partial Ls}$ 和 $\frac{\partial(I/Y)}{\partial Ls}$ 。需要指出的是，用误差修正模型来估计，实际上假定了劳动收入比重是外生变量，而事实上可能并不是如此。在欧洲，总需求可能从两个方面影响收入分配：一是包含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成率 (mark-up) 是顺周期的，这可能与周期性因素带来的工会谈判力量变化有关；二是总需求波动可能会对工资收入有负效应。但我们认为这两条途径在中国可能并不存在，首先是因为中国还不存在工会力量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其次是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我国工资上涨的趋势不是周期性的而是长期性的。因此，我国劳动收入比重的决定力量更有可能是政府的政策变化或制度改革，所以可以视为外生性变量。

(一) 劳动收入比重影响消费率的估计结果

消费在计量估计中通常被当作收入的函数。为了把收入分配变量纳入消费方程中，我们采取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将收入分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分别估计两种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得出 e_{CW} 和 e_{CR} ，从而得出 $\partial C/\partial W$ 和 $\partial C/\partial R$ ；另一种方式则是直接把劳动收入比重 Ls 作为消费的解释变量。

我们首先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各个序列进行了 ADF 检验，结果各序列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即各变量均是非平稳过程。而对各变量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时，结果显示为平稳过程，即各序列均为一阶单整过程 I(1)。模型中所有的变量都设定为对数形式，计量结果见表 1。从表 1 可以看出，所有的估计结果都是有意义和统计显著的。

表 1 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消费率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Delta \ln C$			被解释变量 $\Delta \ln C$		
解释变量	系数	Prob.	解释变量	系数	Prob.
常数项	8.13	0.09	常数项	9.05	0.13
$\Delta \ln W$	0.65	0.13	$\Delta \ln Ls$	0.53	0.46
$\Delta \ln R$	0.19	0.10	$\Delta \ln Y$	0.89	0.25
$\ln C (-1)$	0.29	0.08	$\ln C (-1)$	0.4	0.01
$\ln W (-1)$	0.33	0.03	$\ln Ls (-1)$	0.49	0.09
$\ln R (-1)$	0.34	0.01	$\ln Y (-1)$	0.68	0.03
Adj. R ²	0.88		Adj. R ²	0.82	
DW	3.55		DW	2.13	
弹性			弹性		
e_{CW}	0.81		e_{CLs}	0.77	
e_{CR}	0.18				
e_{CY}	0.99		e_{CY}	0.97	
边际效应 (样本均值)					
$\partial C / \partial W$	2.33				
$\partial C / \partial R$	0.41				
$\frac{\partial(C/Y)}{\partial Ls}$	1.88		$\frac{\partial(C/Y)}{\partial Ls}$	1.76	

e_{CW} , e_{CR} , e_{CY} , e_{CLs} 分别是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总收入、劳动收入比重的消费弹性； $\partial C / \partial W$, $\partial C / \partial R$, $\partial(C/Y) / \partial Ls$ 分别是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消费的边际效应。所有的边际效应指都是样本均值。

在第一项检验中(表 1 的左半部分)，消费的劳动收入弹性和资本收入弹性分别为 0.81 和 0.18。这表明，在长期里劳动收入增加 1%，可使总消费提高 0.81%；资本收入增加 1%，可使总消费提高 0.18%。这说明在长期里我国消费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收入的提高。根据(4)式可以把它们分别转换为 $\partial C / \partial W$ 和 $\partial C / \partial R$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partial C / \partial W$ 为 2.33，而 $\partial C / \partial R$ 为 0.41。二者之间的差额 (1.91)就是功能收入分配对消费率的边际影响，即 $\frac{\partial(C/Y)}{\partial Ls}$ 。这个结果表明，劳动收入比重每增加 1 个百分点,消费率(消费占 GDP 比重)将

增加 1.88 个百分点。

由于上述消费函数是以对数形式进行估计的，消费的劳动收入弹性和资本收入弹性之和应等于消费的总收入弹性 e_{CY} 。表 1 左半部分的 e_{CY} 等于 0.99，很接近与 1，这个数字符合持久收入假说的预期。在表 1 右半部分的第二项检验中，功能收入分配对消费率的边际影响 $\frac{\partial(C/Y)}{\partial Ls}$ 是 1.76，消费支出的总收入弹性是 0.97，均非常接近第一项检验的结果。两项检验的结果互相对照，结论基本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总之，我们对劳动收入比重影响消费率的估计结果表明，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动确实会影响消费支出。这也意味着，在标准的消费函数中加入收入分配变量，将会提供宏观消费行为的新信息。

(二) 劳动收入比重影响投资率的估计结果

在宏观经济模型中，投资经常被表述为产出、长期真实利率和其他资本成本的函数。在我们的模型 (1) 式中，除上述因素外，资本收入也被纳入模型作为投资的解释变量，该变量可以代表收入再分配对投资的影响。因此在投资方程中，解释变量分别是 GDP、资本收入和长期真实利率。首先，我们用无约束的误差修正模型估计投资函数；然后，我们将产出对投资的长期影响系数约束为 1，并再次估计投资函数。加入这个约束实际上意味着，长期里投资-产出比例是稳定的。表 2 分别报告了两种方式的估计结果，其中左半部分是无约束的估计，右半部分是有约束的估计。

表 2 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投资率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Delta \ln I$			被解释变量 $\Delta \ln I$		
解释变量	系数	Prob.	解释变量	系数	Prob.
C	-1.97	0.04	C	-1.59	0.03
$\Delta \ln Y$	3.46	0.01	$\Delta \ln Y$	3.34	0.03
$\Delta \ln R$	-0.68	0.00	$\Delta \ln R$	-0.63	0.08
$\Delta \ln i$	0.00	0.03	$\Delta \ln i$	0.00	0.11
$\ln I(-1)$	-0.43	0.00	$\ln I(-1)/Y(-1)$	-0.44	0.00
$\ln Y(-1)$	0.50	0.01	$\ln R(-1)$	0.13	0.00
$\ln R(-1)$	0.06	0.23	$\ln i(-1)$	0.00	0.07
$\ln i(-1)$	0.00	0.09			
Adj. R ²	0.59		Adj. R ²	0.61	
DW	2.34		DW	2.56	
弹性			弹性		
e_{IR}	0.15		e_{IR}	0.17	
e_{IY}	0.85		e_{IY}	0.78	

边际效应（样本均值）			
$\frac{\partial(I/Y)}{\partial Ls}$	-0.10	$\frac{\partial(I/Y)}{\partial Ls}$	-0.13

e_{IY} 和 e_{TY} 分别是资本收入和总收入的投资弹性； $\partial I / \partial Ls$ 是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影响投资的边际效应。所有的边际效应指都是样本均值。

从表2可以看出，两项估计得出的长期系数都比较相似。无约束条件下估计出的投资的资本收入弹性是0.15，而有约束条件下投资的资本收入弹性是0.17。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资本收入每增加1%，将使得总投资增加0.15%。这表明在总体国民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收入比重提高会导致总投资下降。根据(5)式可以进一步估计得出劳动收入比重影响投资率的边际效应，分别是-0.10和-0.13。即劳动收入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投资率(投资占GDP比重)将减少0.10个百分点左右。可见，与消费相类似，劳动收入比重变动也会影响投资，只不过影响投资的效应小于对消费的影响。这个结果证实了新闻界和部分学者对提高劳动收入比重，或者提高劳动者工资的宏观后果的猜测，即涨工资可能会提高劳动成本，降低预期利润率，从而对投资产生负面效应。但本文的计量结果也表明，虽然这种负面效应客观存在，但它的影响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对微观层面某些具体的企业的影响；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于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影响投资率的边际负效应大大低于影响消费率的边际正效应，所以该比重的提高对整体经济增长率的作用可能是正面的，这说明很多人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三）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影响国内需求的估计结果

下面我们试图求出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国内总需求的影响效应，这可以通过计算 $\frac{\partial(C/Y)}{\partial Ls} + \frac{\partial(I/Y)}{\partial Ls}$ 来估计得出。表1和表2提供了1992-2007年间 $\frac{\partial(C/Y)}{\partial Ls}$ 和 $\frac{\partial(I/Y)}{\partial Ls}$ 的平均值。从这两个平均值可以看出，在封闭经济体系下（即不考虑净出口），16年间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消费率的正面影响远远高于对投资率的负面影响。为了准确地解释16年间的动态变化，我们运用同样的方法得出了1992-2007年间每一年的 $\frac{\partial(C/Y)}{\partial Ls}$ 和 $\frac{\partial(I/Y)}{\partial Ls}$ ，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1992-2007年间每一年中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消费率的正面影响都远远高于对投资率的负面影响。因此国内劳动收入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对国内需求产生积极的正面促进作用。按照表3的数据，将使国内需求增加1.53%~2.15%之间，平均增加1.82%，这表明中国国内需求属于工资驱动型，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将有利于扩大内需。这一结论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许多人担心劳动收入比重的提高将引起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倒闭，私人投资萎缩。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甚至将提高劳动者工资与欧洲的社会福利病相提并论，声称提高劳动者工资将使中国出现欧洲式的长期不景气。而这里的计量结果表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劳动收入比重提高的总效应是扩大内需，在长期里对经济增长反而有利。

表3 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国内需求的影响

年份	消费 (1)	投资 (2)	国内需求 (3) = (1) + (2)
1992	1.61	-0.06	1.56
1993	1.59	-0.06	1.53
1994	1.63	-0.05	1.58
1995	1.65	-0.06	1.59
1996	1.73	-0.07	1.66
1997	1.76	-0.07	1.69
1998	1.86	-0.08	1.78
1999	1.83	-0.09	1.74
2000	1.91	-0.12	1.79
2001	1.85	-0.13	1.72
2002	1.88	-0.14	1.74
2003	1.96	-0.14	1.82
2004	2.19	-0.10	2.09
2005	2.28	-0.13	2.15
2006	2.26	-0.13	2.13
2007	2.09	-0.14	1.95
均值	1.88	-0.10	1.82

(四) 劳动收入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最后，我们需要计算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根据(3)式可知 $\frac{dY/Y}{dLs} = \frac{h_2/Y}{1-h_1}$ 。其中 h_2/Y 可变换为 $\frac{\partial(C/Y)}{\partial Ls} + \frac{\partial(I/Y)}{\partial Ls}$ 之和，也就是表3所列出的推算结果。为了考察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本国总产出的影响，我们借鉴 Stockhammer(2007)的方法，推算 1992-2007 年的乘数 $\frac{1}{1-h_1}$ 。估计出乘数之后，即可根据(3)式计算出劳动收入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见表4）。由于乘数 $\frac{1}{1-h_1}$ 在稳定状态下应为正数，而表3中列出的 $\frac{\partial(C/Y)}{\partial Ls} + \frac{\partial(I/Y)}{\partial Ls}$ 每一年都是正数，因此在 1992-2007 年，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本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frac{dY/Y}{dLs}$ 也必然每一年都是正数。所以，我们没有列出每一年的影响系数，而只是列出了 1992、2007 年和平均值情况下的影响系数。从表4可以看出，在不考虑劳动收入比重对净出口的影响下，劳动收入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本国总产出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按平均值计算，1992-2007 年间的劳动收入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带来的本

国总产出增加量为 1.16%，这证实了我们先前的判断，即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在总体上不仅不会损害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也意味着，如果政府把提高劳动收入比重作为一项经济政策的话，那么该政策可以起到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作用。因为劳动收入比重提高不但能够提高工资收入者的经济地位，而且它本身就有缩小规模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Daudey and Garcia-Penalosa（2007）的跨国研究就表明，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可以降低基尼系数。我们利用中国的省级面部数据也证明，中国的劳动收入比重提高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杨天宇，2010）。

表 4 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 国内需求的影响 (1)	乘数 ($\frac{1}{1-h_1}$) (2)	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 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3)
1992	1.56	0.77	1.20
2007	1.95	0.61	1.19
均值	1.82	0.64	1.16

依据表 4 给出的结果，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计算出，如果“十二五规划”期间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引言已经指出，如果“十二五规划”期间 GDP 年增长率为 9.5%，则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就相当于居民收入占 GDP 的总量由现在 57% 上升至 60%。如果换算成劳动收入比重，则相当于劳动收入比重由 2007 年的 42% 左右提高到 2015 年的 50% 左右，即提高约 8 个百分点。而根据表 4 给出的结果，按照 1992-2007 年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计算，2007-2015 年劳动收入比重提高 8 个百分点，将使得 2007-2015 年期间的本国总产出增加 9.28%。这相当于在“十二五规划”期间（2011-2015）使本国总产出增加 5.8%。可见，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强的。

四.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经验

上面我们指出，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可以同时起到效率和公平的作用。日本的经验可以证实这一点。日本在 1961-1970 年间实施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具体目的是在 10 年内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 1 倍以上。可见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与我们所说的居民收入倍增有一定区别。因为日本政府的政策目标不仅包括了人均国民收入指标，而且包括了经济总量指标。对我国来说，总量的“国民收入倍增”并不困难。事实上 2005 年我国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就已经提出 2010 年的 GDP 总量和人均 GDP 要比 2000 年翻一番。这个目标已经超额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在 2000-2010 年实际上已经实现了日本所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这显然对我国来说是很不够的，因为我国的居民收入、劳动收入占 GDP 的比重在 2000-2010 年间呈下降趋势，没有起到足够

的扩大内需的作用。所以我们才提出使居民收入翻番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我国的启示，不在于其目标，而在于其方式。1961-1970年间人均国民收入的翻番，伴随着劳动收入占GDP比重的上升，这意味着老百姓很好地分享了国民收入的倍增，这与我们提出的通过提高劳动收入比重来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的思路使一致的。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效果是兼顾了效率和公平的：

1、从公平来看，根据南亮进（2008）提供的数据，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的结果是劳动收入比重上升和居民收入差距的下降。日本的劳动收入比重在二战结束之后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由1950年的70%左右下降到1960年的65%左右。自1960年起劳动收入比重持续上升，1970年超过70%，70年代末又达到80%。与此同时基尼系数出现下降，由1963年的0.376下降到1980年的0.337，这与Daudey and Garcia-Penalosa（2007）的研究结论非常一致，即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提高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2、实现了社会公平的同时，经济增长也出现加速。扣除物价因素，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实际国民收入都实现了翻番，前者用了大约6年，后者用了大约7年。日本在此期间的高速增长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但据日本本国学者的研究，有两个重要因素与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收入差距的缩小有关：第一，南亮进（2008）指出，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收入分配的平等化，带来了社会稳定和民主主义一定的发展，这促进了私人投资，并因此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第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制定者之一，日本大藏省财务调查官下村治发表的著名论文《日本经济的基调及其增长力》（1959）指出，决定供给能力是投资，决定有效需求主要靠消费，并且认为消费增加可以将投资增长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具备更加广泛、深入的产业和经济波及效果。如果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则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会增加，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他的论断后来被经济增长的实践所证实，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也曾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但在60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大大减轻。

虽然中国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和目标与日本并不相同，但日本的经验证明，在提高劳动收入比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同时加速经济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五. 结论和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1992-2007年中国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对劳动收入比重变动与消费率、投资率、国内总需求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以此为基础测算了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对经济增长率的拉动作用。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属于工资驱动型（wage-led），提高劳动收入比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但却大大刺激了消费，其总的效应是扩大了国内需求。在不考虑净出口的情况下，劳动收入比重对内需的刺激作用将转化为对经济增长率的正向效应。由于劳动收入比重提高还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所以提高劳动收入比重将是一项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政策。

在此基础上，本文还测算了拟议中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结果发现拉动作用相当强，“十二五规划”期间的居民收入倍增，将使“十二五规划”期间

(2011-2015)本国的总产出增加 5.8%。2008-2009 年以 4 万亿投资计划为代表的经济刺激计划,虽然缓解了经济衰退,但容易造成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上涨、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的弊病。此类经济刺激计划迟早要退出市场,此时若能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则可以大大抵消经济刺激计划退出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效应,从而避免宏观经济的二次探底。而且,“十二五规划”期间正是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大好时机。据日本学者南亮进(2008)的研究,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通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由过剩变为短缺,从而迫使劳动收入比重(日本学者称之为劳动分配率)上升。我国目前是否已经通过刘易斯转折点还有争议,但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上涨趋势已经形成。此时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的。

最后我们提出几条政策建议。根据本文的研究,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要依靠提高居民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劳动收入来达到。这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通过何种方式提高劳动收入比重,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对经济增长率的负面冲击最小。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劳动收入比重提升主要是对投资有抑制作用。但不同的提升劳动收入比重的方式,可能会对投资产生不同的抑制作用。例如,如果劳动收入比重提升的主要方式是政府行政命令导致的,而不是市场需求变动导致的,那么可能负面效应更大。政府管制部门由于信息限制,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一刀切地出台所有企业涨工资的政策,这更有可能使某些行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并抑制私人投资。与此相对应的是市场的作用。罗长远、张军(2009a)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他们发现第三产业的劳动收入比重高于第二产业,因此只要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第三产业为主,即使政府不出台强制性的政策,总体的劳动收入比重也自然会提高。这意味着政府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可能比出台强制性政策的效果更好,而且没有副作用。这就要求拓宽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降低私人资本进入这一领域的壁垒。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开放不仅滞后,而且呈不对称的态势,私人资本往往并不享有与国有资本和外资同等的机会。如果私人资本进入第三产业的的空间得到扩张,有助于增加这一部门的资本存量,从而带动更多的就业。另外,第三产业还具有一个特点,它的很多产品都不可贸易。不可贸易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国际竞争而获取高收益,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者从而有机会从中获取更多的收入份额。

第二,劳动收入比重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或者说通过什么途径能够更有效地提高劳动收入比重。在这方面国内学者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白重恩、钱震杰(2009)利用 1995-2004 年产业部门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结构转型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两个因素导致全国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了 5.38 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改制和产品市场垄断增加是工业部门资本收入比重上升、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李稻葵等(2009)的研究发现,劳动收入比重变动与经济发展存在 U 型关系,产业结构变动和劳动者相对谈判能力也是影响劳动收入比重变动的因素。罗长远、张军(2009b)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财政支出以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劳动收入比重上升。如果他们的论证正确,则降低国内产品市场的垄断程度(白重恩等),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劳动者的谈判能力(李稻葵等),增加对劳动收入的财政补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罗长远等)都可以提高劳动收入比重。此外,南亮进(2008)

指出日本劳动收入比重上升的关键在于通过了刘易斯转折点，而更快地通过刘易斯转折点的原因在于落后部门（乡村）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由低于制度工资的状态转变为等于工资，并随工资而变动的状态，也就是劳动供给曲线由无限弹性变为有限弹性。照此逻辑，则提高我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有助于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更快地赶上农业工资水平，从而能更快地通过刘易斯转折点，这也间接地有利于劳动收入比重的提高。

参考文献

- 白重恩、钱震杰，2009：《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第3期
- 南亮进，2008：《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日本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2009：《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经济研究》第1期。
- 罗长远、张军，2009a：《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 罗长远、张军，2009b：《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管理世界》2009年第5期。
- 杨天宇，2010：《劳动收入比重与居民收入不平等》，打印稿。
- Bowles and Boyer, Wages, Aggregate Demand, and Employment in an Open Econom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Epstein, G.A. and H.M. Gintis (eds.), *Macroeconomic Policy after the Conservative Era: Studies in Investment, Saving and Fin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Daudey and Garcia-Penalosa, "The Personal and the Factor Distributions of Income in a Cross-Section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3, no. 5, 2007.
- Davison, J., Srba, F. and Yeo, S, 1978. Econometric modelling of the aggregate time-series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s' expenditure and income in the United Kingdom. *Economic Journal*, 88, pp.661-692.
- Naastepad and Storm, OECD demand regimes (1960-2000).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Vol.29, No.2, 2007, pp.211-246.
- Stockhammer, Ederer, Demand effects of the falling wage share in Austria. *Empirica*, Vol.35, No.5, 2008, pp.481-502.
- Stockhammer, Onaran and Ederer, Func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aggregate demand in the Euro-Area.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102, 2007.